

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从陈玉成遇害看投降派的危害

黄 刚

陈玉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杰出将领。他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十四岁参加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十八岁独立带兵作战，二十一岁主持天国军事，二十三岁晋封英王，成为天王洪秀全的得力助手和太平天国革命军的顶梁柱。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破湖北，破九江，破江西各府州县，破江苏、安徽，合计州县一百五十余处”，以赫赫战功，使敌人闻风丧胆，称他是“贼中之最为可恨者”，“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然而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没有在战场上死于敌人的刀光剑影之下，枪林弹雨之中，却被混入太平天国革命内部的投降派苗沛霖用“美言”诱捕，最后壮烈牺牲。回顾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投降派的危害性和识别投降派的重要性颇有教益。

一八六一年九月安庆陷落后，太平天国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愈来愈恶劣了。一八六二年三月，驻守庐州（今合肥）的陈玉成决定放弃这座孤城，突围北上攻取汴京（今开封），以便北拒黄河，南及长江，“广招兵马”，然后大举反攻，图解天京之围。正在这时，有个扮作乞丐模样的人求见陈玉成，从竹杖里取出驻守寿州（今安徽寿县）的太平军将领、奏王苗沛霖写在黄缎子上的亲笔信，诱劝陈玉成到寿州去，他可以派兵联合“攻打汴京”。苗沛霖怕陈玉成不上钩，还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写道：“孤城独守，兵家大忌，以英王盖世英雄，何必为这股残妖所困”。对于这封信，陈玉成虽然不止一次地召集部将商议，并且有人提醒过苗已暗地里投降清朝，“万不宜去”，但没有引起他的警觉。四月十四日深夜，陈玉成率部突围，踏破清军三座营盘，北走寿州。到寿州后，苗沛霖假意殷情接待，暗地里却使用阴谋手段，将陈玉成的三千精兵安排在城外驻扎，只许他带“百余人入城”。这时，陈玉成仍然没有识破苗的阴谋，结果当“伏兵齐起”时，完全失去了自卫和反抗的能力，束手被捕。

苗沛霖要投降清朝，但他知道由于自己的“反复无常”，身价不高。为了抬高身价，换得主子的青睐；捞到更高的官职，他想要交给清王朝的不是一个坚持革命立场的“贼首”，而是一个象他那样倒戈投降的奴才；于是使“英王所居宫殿，华丽已极”，并于当晚派他的侄儿苗天庆向陈玉成劝降，吹嘘“清朝洪福过大”，“祈英王同享大清洪福”。陈玉成怒不可遏，指着苗天庆的鼻子厉声骂道：“尔叔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棵草，风吹二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表示“只可杀，不可辱！”苗沛霖无可奈何，将陈玉成献给清军将领胜保。胜保欣喜若狂，耀武扬威，要陈玉成下跪。陈玉成严词拒绝，讥笑胜保是“见仗即跑”的草包，问他是否记得白石

山一仗，“二十五营”精锐马步兵“全军覆没”，只他一人“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的丑史；最后大声驳斥：我是堂堂天朝的开国元勋，“怎配（能）跪你”？怒骂胜保是“好不自重的物件（东西）”！敌人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但忠于革命事业的陈玉成坚贞不屈，声言“大丈夫死则死耳”，决“不能投降”，表现了革命战士“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也有有力地驳斥了农民起义“必然投降”和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类谬论。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陈玉成在被押往北京的途中，在河南延津惨遭杀害，“磔于市，传首皖楚”。死时年仅二十六岁。

陈玉成的牺牲，是太平天国革命的重大损失。在太平天国反皇帝、反封建的革命路线指引下，他率领部队东征西讨，勇猛杀敌，驰骋在大江南北的广阔战场上，建立了丰功伟绩。特别在太平天国由于混进内部的阶级敌人的破坏和中外反动派疯狂围剿而处于困难重重的形势下，他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毅然决然地肩负起支撑危局的重任，奋不顾身地捍卫着安徽根据地，并不断地以人力和物力接济天京（南京），从而保障了天京的安全。陈玉成殉难后，他率领的这支大军遭到严重损失，安徽局势更加恶化，天京从此失去最重要的屏障，完全暴露在敌人的进攻之下。诚如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所说：“如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仅仅两年后的一八六四年七月，天京便陷落了。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又一次告诉我们：投降派是多么危险的敌人！

苗沛霖何许人也？他是出身富豪之家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一八五六年，响应太平军起义的捻军没收了他的家产，他怀着对农民起义军的刻骨仇恨，组织起地主土匪武装“团练”，“雄据一方”，被清军反动将领胜保看中，“录为门下士”。接着“以剿贼叙功”，很快由知县晋升为记名道员，但他仍“以官不利己”，不满意没有实缺的挂名道员，加之与地主阶级的另一派如员外郎孙家泰等有些狗咬狗的小矛盾，便怀有“异志”，想投太平天国革命之机。“两面手法和伪装”是一切投降派潜入革命队伍的“唯一手段”。苗沛霖这个反动家伙混入太平军，正是这样。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在太平天国打下大半个中国的大好形势面前，他认为有机可投，就打着反对孙家泰等反动官僚的旗号，要练丁剃去辫子而“蓄发”，“声称寻仇”，进攻皖北军事重镇寿州，“乘势为叛”，抢占地盘数百里，扩充军队十余万，声言反对清朝，拥护太平天国革命。但是暗地里却和清王朝的安徽巡抚翁同书相勾结，表明忠于清朝皇帝的“心迹”不变，愿意进剿太平天国“立功”。为了掩盖其两面派的真面目，骗取太平军的信任，在攻陷寿州后，有意杀死了孙家泰全家和一批地方官吏、恶霸地主、土豪劣绅，表示自己和清王朝决裂。这样，果然骗得了太平天国和陈玉成的信任。一八六一年九月，由陈玉成“送印亲封”他为“殿前北方电察天军顶天扶朝纲奏王和千岁”。一八六一年底至一八六二年初，太平军连战失利，他认为太平天国大势已去，向胜保乞求“反正”，准备接受胜保的招安条件，投降清朝。历来的投降派“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他们出卖革命，总是以革命者的鲜血为代价的。陈玉成这样一个优秀的革命领袖，就这样被苗沛霖当作邀功请赏的“礼物”，送给了他的主子。

“一切反动派的企图是想用屠杀的办法消灭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投降派都是反动派。《水浒》中的宋江同高俅、蔡京，苗沛霖同胜保、翁同书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噬杀成性的豺狼，都具有“反革命者的野兽性”。所不同的是：高俅、蔡京、胜保、翁同书是张牙舞爪、眼里露出凶光的豺狼，是公开打着白旗、明火执仗的反革命；而宋江、苗沛霖则是“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打着革命的旗帜，却在暗地里“偷偷做着”阶级敌人的勾当。他们的手段比张牙舞爪的豺狼和公开的敌人更狡猾、

更毒辣、更残忍，有更大的欺骗性；因此，也不容易识别。然而，充分认识他们这种“野兽性”，对于革命者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陈玉成的失败，就在于没有认识苗沛霖这个投降派的反革命“野兽性”。苗沛霖以“故交”的身份出现在陈玉成面前，又看准了陈玉成“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的战略思想，因而“累书招玉成”北上，特别是最后一封用黄绶子写的信，“谄谀”之话，“至极无以复加”，使陈玉成有“恰如心思”之感，称赞苗沛霖“真有韬略”，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致使落入圈套，做了投降派的阶下囚。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作为投降派的典型，苗沛霖同宋江和历史上其他许多投降派一样，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投机革命的野心家，阴险狡猾的两面派，反动阶级的别动队，凶残毒辣的刽子手。在思想上，他们都笃信孔孟之道，宋江“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苗沛霖供认自己“遍读诸史”。在政治上，他们都反对农民起义，主张忠于皇帝，宋江喝了御酒临死前，还念叨：“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苗沛霖则公开叫嚷“见义兵莫大于勤王”。在策略上，他们都是首先投机革命，等待时机，然后出卖革命，向反动统治阶级投降，葬送革命事业，而自己则求得一官半职，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但是，由于他们又各是自己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阶级斗争的发展阶段和客观条件不同，统治阶级时而需要这样的奴才，时而需要那样的奴才，因此应运而生的投降派进行投降活动的手法也不断地变化着：或者篡夺领导权，改变革命路线，分裂革命队伍；或者诱杀革命领袖，破坏革命领导机关，使革命队伍分化瓦解，如此等等，目的都是破坏革命。苗沛霖就是这后一类投降派，他投机革命，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洪秀全领导下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并建立了强大的农民革命政权之后；这时，他想篡夺革命领导权和修正太平天国的革命路线是困难的。因此，就采取了诱杀革命领袖这种卑鄙手段，以此瓦解革命队伍，扑灭革命烈火。我们要识别投降派，不仅要认识投降派的共同特点，还要认识在不同条件下他们所使用的不同手法，并透过这些不同的手法去发现他们的共同本质。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古代、近代投降派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清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都是投降派，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蛀虫。当他们窃取了革命领导权的时候，就拼命地篡改党的正确路线，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如陈独秀、王明都是如此。如果他们的路线不能得逞，那就搞分裂主义，象张国焘分裂红军那样，或者出卖革命领袖和革命组织，刘少奇三次被捕，三次叛卖，供出我党组织的机密，就是这样干的。林彪则可谓种种手法齐备，他既想篡党篡军，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又梦想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果这两手不成，便妄图分裂我党，另立山头。这些修正主义头子的共同目的，都是对内搞阶级投降，出卖革命，葬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外搞民族投降，出卖祖国，把中国变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毛主席在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中号召我们，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投降派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在当前，我们要联系历史上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总结经验教训，充分认识投降派的危害性，不断提高识别形形色色投降派的能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中共黄冈地委宣传部写作组供稿）